

史海拾珠

编辑 孙明道 电话 67655582 E-mail:zzwbwh1616@sina.com

埃及驻华使馆 1950 年凶案真相

深夜，匪徒入室抢劫

1950年9月3日晚11点钟，初秋的夜晚，凉风习习，前埃及驻华使馆里静悄悄的。此时早有预谋的3名匪徒戴着口罩，一高一矮，另一中等个、穿着灰衬衣的匪徒手持刀枪、手电筒及绳子翻入前埃及驻华使馆内，响声惊动了看门师傅(兼花工)黄启府，黄刚出屋察看，就被突如其来3名匪徒捆了一个结实，口中塞进一团布。匪徒又急忙窜至使馆管事陈万钟卧室，高个子持枪威胁说：“你不要喊，我们是来台湾来的，是想向外国人借点路费返回台湾，快说！保险箱放在什么地方？”陈万钟回答不知道。3名匪徒无奈强行推拉着陈、黄二人来到女佣顾妈的卧室，惊恐的顾妈正要喊叫，已被布团塞住嘴，并被捆绑起来。3名匪徒随即分工，由矮个看守三名佣人，由高个和“灰衬衣”急速冲上楼去埃及驻华代办阿巴提的房间。

即将回国的阿巴提早已进入了梦乡。匪徒蹑手蹑脚推开门，直奔保险箱，高个子匪徒不慎被小板凳绊倒，阿巴提梦中被惊醒。见两匪徒气势汹汹直冲床前，阿巴提感到不妙，起身与匪徒搏斗，他们从楼上打到楼下。看管佣人的矮个子闻声

后忙赶来行凶，用尖刀对着赤手空拳的阿巴提胸口猛刺数刀。惨叫声划破了宁静的夜空，也惊醒了隔壁居室的阿巴提夫人阿芙萝。阿芙萝也冲出卧室，拿起电话，但没有声音，显然是电话线被剪断了。阿芙萝呼喊喊着冲出房间，急忙替佣人们松绑，吩咐管事陈万钟立即报警，此时3名匪徒已夺路逃跑。

侦查，警方顺藤摸瓜

数分钟后，警笛长鸣，数辆警车停在使馆门前。首先是市公安局刑警大队的同志赶到现场，封锁了使馆区域，迅速将已昏迷在血泊中的阿巴提送到鼓楼医院抢救，并对案发现场进行了勘查，现场发现几处血迹，匪徒丢下的手电筒1只、白纽扣3枚，楼梯上发现匪徒遗留的用棉布新布制成的口罩1只，在匪徒越墙处发现有手掌血印，在墙外有土造枪1支。根据警犬追踪，在离墙100米处又发现一只同样的口罩，上面有血迹，在离墙200米处有一发子弹。又据佣人口述，同年3月，使馆曾开除了西厨张铭山，张曾扬言过要报复。为此，侦查员顺藤摸瓜，找到张铭山家。据悉，张9月3日确实未出门。根据初步调查情况，市局、刑警队、分局对案情进行分析讨论，一致认为匪徒是乘三

轮车逃走的，两只口罩做工粗糙，很有可能是一般裁缝制作，此案必有内线，对张铭山还是要暗中监视。侦查员们做了明细分工，决定再次深入调查。

命令，三天必须破案

1950年9月4日凌晨，市公安局副局长黄耕夫立即传达了市长柯庆施的3天必须破案的命令，大队长王忠及洪沛霖深感肩上的担子沉重。经过充分讨论，决定对使馆有关的人员展开全面调查。

当侦查员再次找到张铭山谈话时，张提供了一个重大线索：使馆雇工顾妈跟原使馆雇工吴其伟关系密切。吴1950年3月被解雇后，至今失业，吴时常到使馆来找顾妈。刑警立即对吴的住处监视并传其到派出所谈话。吴经过反复教育后如实供述了在大使馆的所见所闻。

吴称，9月3日白天他在大使馆门口等顾妈时，看到一个穿白绸褂的大个子，在使馆门口绕来绕去，又不像找人的样子，曾有5次类似情况。刑警又再次向张铭山调查时，张提供了此人名叫高遐昌，原系旧警察，国民党警卫队勤组长，解放后保留用，后因违纪被开除出公安队伍，市公安局决定立即

拘捕高遐昌以及嫌疑人张铭山、张明亮、邵治映。

突审，案犯胆战心惊

首先对高遐昌进行突击审讯。高遐昌知道此次被抓凶多吉少，但又不甘心交代罪行，带有试探性地将其过去当旧警的罪恶一股脑儿说了出来，并保证解放后从未干过坏事，愿以脑袋担保。王忠起身将桌子一拍，厉声喝道：“要你坦白是给你赎罪的机会，我们对你的罪行已全部掌握，隐瞒对抗必将严办！”高遐昌被严厉的训斥吓得胆战心惊，像一只斗败了的公鸡低下头，如实缴了交代：“南京解放前夕我未来得及随国民党逃走，心里后悔，多次想寻找机会跑到台湾去。1950年2月我巧遇老相识李善修，两人臭味相投，都打算去不成台湾先到香港，但要弄到钱，跟共产党较量一下，先成立一个‘中国人民反抗俄救国会’组织。两个人商议后，先后发展了成员20余人，印制了150张的反革命传单。为了筹集经费，以‘中国人民反抗俄救国会’图为

背景的函件，向前美国驻华大使馆会计李鸿年勒索了20万元，又向山西路新食品公司和申向西面粉号敲诈未遂。后来我提议，经费筹集太慢不如搞大的。一次成功，有一天，我们再次议论此事时，正好内弟张明亮在场，因其酗酒，前几天被埃及使馆开除，他怀恨在心，正想伺机报复。于是提供了阿巴提的卧室放有保险箱，内有黄金、美钞的信息，我们就开始密谋抢劫。”

根据高提供的线索，刑警队立即对张明亮的住处进行搜查，从张家中搜出一双带血迹的“回力”球鞋，血迹呈喷射状，随后将张明亮带到审讯室与高遐昌对质，高第一句话就垂头丧气地说：“我已全部交代了。”张明亮本想狡赖一番，但事到如今只好交代了犯罪事实，陈述了提议抢劫的是张铭山，抢劫的主谋是高遐昌，张明亮带着陈学荣和俞良坤干的。至此，“9·3”血案真相大白。

摘自《档案》

刻板的饮食习惯

袁世凯最有特点的是刻板而保守的起居饮食习惯。袁世凯的起居饮食在一年四季都有一套固定规矩。据他的三女儿回忆，在担任总统期间，袁世凯每天早上6点钟起床洗漱，在6点半吃早饭，他总是在中南海的仁仁堂楼上吃一大海碗的鸡丝汤面作为早饭，然后他便捧着包着铁头的藤杖“梆、梆”的下楼去，最后发出响亮的“哦”表示他来了，这才完成他下楼的“仪式”。

袁世凯下楼后，便在办公室里忙于公务。他十分有规律，到了中午11点半就要吃午饭了。他对于饭菜的要求并不高。不像清朝的皇帝午饭有上百道菜，而且只身不重复。虽然到溥仪时只有身边的菜是新鲜的，离得远的菜是发霉的。袁世凯的饭菜花样经久不变，而且摆的位置也不变。例如，入冬后每顿必有他最爱吃的清蒸鸭子，而且一定摆在桌子中间。韭黄肉丝必定摆在东边，红烧肉摆在西边，身边放着朝鲜族三姨太的拿手菜“高丽菜”。他的主食带有鲜明的河南特色。除了每顿必备的馒头和米饭，还要有好几种稀饭。如大米稀饭、小米和玉米掺在一起的稀饭，还有一种河南人的饭菜——绿豆糊糊。袁世凯专用的餐具都比常人的大和长，饭量也相当惊人。

一般下午7点，袁世凯家就要吃晚饭了。平时的晚饭按部就班，而星期日的晚饭就丰盛多了。这是袁家人全家聚会的时候。除了大厨房供应的菜之外，各房的姨太太们都会带各自做的有特色的菜来与大家同吃，例如二姨太做的美味熏鱼。这时的袁世凯一改平日的严肃，与大家随意说笑，逗儿女们玩。这时的中南海袁家与普通的家庭无异，全家共享天伦之乐。周末聚会大约持续到9点，袁世凯便要就寝。

荒唐的封建家规

袁世凯每天午饭后，习惯午睡大约一个小时，下午2点开始在办公室工作，直到晚上5点后停止工作。他便与姨太太们

袁世凯的生活习惯

和年龄较小的儿女们到中南海各处去散步。他游园的排场与古代的皇家不相上下，即命名在自己住的中南海也要“净园”。在袁世凯一行准备去哪看看时，没出门前的一个小时就有人按传下来，吹着哨子，沿途四周通知，叫人们回避，免得不相干的人无意中“惊驾”。

夜间休息，袁世凯制定了姨太太轮流值宿的制度。轮到谁，谁就由丫头们把用具搬到袁世凯的卧房里。虽然他名义上有9个姨太太，但是实际同居的只有五、六、八、九四个姨太太。每人轮值一星期。虽说太迟，但第二天早晨却依然要五姨太伺候一切。五姨太是袁世凯的得力管家，他的吃穿等项事只有五姨太才能打点好。五姨太自然受他宠爱，但是当袁世凯死后，五姨太第一个把袁世凯的值钱细软席卷一空，夺门而逃。

袁世凯的姨太太们进入这个封建大家庭就要遵守袁世凯制定的种种“家规”。新进门的姨太太要服从早进门的姨太太管束。所有的礼节、起居和言谈都要由老的教导，新的不

得有丝毫的违抗。在这个家规的名义下，大姨太和五姨太虐待其他姨太太。大姨太曾经把三姨太绑在桌子上毒打，以致三姨太左腿残疾。袁世凯作为家长，对于这些争风吃醋的后院事情总是睁只眼闭只眼，任由它去。

虽然在中南海内设有专馆对子女进行教育，但是这种私塾式的机构课程设置不系统，纪律不严明，例如姨太太们和小姐们一起上课，常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况：某姨太太在课堂上忽然站起来说：“先生，我请一会儿假。”然后便走出教室问自己的丫头“总统吃的饺子预备有没有”之类的，然后再回到座位上继续听课。若每个姨太太都这么来一次的话，课简直没法继续下去。逢年过节，老师们想向袁世凯拜年问候，他总是借故不见。袁世凯除了用专馆教育外，对于子女就是一味地严厉了。尤其对于儿

子们，常用皮鞭或棍棒抽打。因此，虽然袁世凯花了大量人力、物力，效果也不尽如人意。

令人费解的习惯嗜好

袁世凯的有些生活习

沙俄皇储来华“坐轿”

光绪十六年冬，经过俄皇太后从中斡旋，俄国太子获得了沙皇的准许，通过驻华使节传递消息，表示希望次年春天津游历中国，初步确定访问5个地方，重点是湖北汉口。清朝政府当时弄虚作假借助俄国的力量来抗衡日本，所以对俄国太子的来访，喜出望外，高度重视。主管外交的总理衙门，更是紧锣密鼓，布置迎接。可是这位俄国的太子人还没到，就先给总理衙门出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难题。

原来俄国太子为显示身份，给自己订做了一项中国帝王乘坐的黄色轿舆。俄国太子这种作法在当时叫作“逾制”。按大清律例，官员逾

制，性命难保，所以总理衙门进退两难。若是同意，对朝廷不好交代；若不同意，则有碍邦交。况且俄国使臣多次声明，所谓黄轿，实为金色。经过反复交涉，直到光绪十七年二月，俄国方面仍然坚持：太子自备黄轿，欲与疆帅稍示区别，绝无他意。看来这轿子是非坐不可了。时任湖广总督的张之洞主管接待，对俄国人的固执非常恼火。俄国海军官员先期赴鄂，张之洞竟然拒绝接见，引起俄国人极大不快。后经总理衙门赔礼道歉，又表示张之洞，派员修好，才算不了了之。但轿子事件还没解决。张之洞向总理衙门建议，沿途搭建布棚，遮挡众人视线，避免扩散

影响着“乡土气”。众所周知，袁世凯上嘴唇留着两撮大胡子。而他吃东西的速度比一般人快，一大海碗的面条几口就能吃完。他在吃稀饭或喝汤时常弄得胡子、衣服上都是汤汁，但他从不用手绢，即使是擤鼻涕也只用衣袖擦擦。所以他的衣服上就常常残留着污迹，恶心至极。一般都是姨太太们准备着手绢和毛巾给他擦衣服。

袁世凯也不爱洗澡，与很多传统的中国农民一样，他只在每年过年时洗一个澡。平时只是用湿毛巾擦一擦身体就完事。而且他不用抽水马桶，一定要用木头的马桶。人家问他为什么不用干净卫生的洋马桶时，他却回答“那个味儿不好”。

袁世凯还喜欢缠足的女人，除了三个朝鲜籍姨太太是天足之外，其余所有的妻妾都是小脚。这三个姨太太为了取悦他，只得依照京剧中花旦、武旦“踩寸子”的办法，做出缠足的样子来。以致后来这三个姨太太不会正常走路了。

袁世凯喜欢吃中药来补身体，常常把人参一把鹿茸的放在嘴里嚼着吃。更荒唐的是他还雇用了两个奶妈，每天就喝两个奶妈所挤出的奶奶。

摘自《世纪》

胡宗南改地名

胡宗南号称“西北王”，是蒋介石嫡系，这是众所周知的，但胡宗南好大喜功，热衷改地名就不为人知了。

抗战胜利后，胡宗南秉承蒋介石打内战旨意，积极向西北延安进犯。

1947年初，胡宗南在西安，有人对他讲，近日在古都洛阳掘出一块古碑，碑上刻有“一轮古月照中华”七个大字。胡的幕僚对他阿谀地说：“古月”者，‘胡’也。这将应验

天将降大任于将军身上，是为复兴中华，重振西北之吉兆也。”胡宗南听了大喜，也以为果然，就下令将西安南面著名的终南山改名为“宗南山”，又把王曲镇附近的青龙山改为近音的“兴隆岭”，以应两地合在一起就是“宗南兴隆”。胡宗南迷信到如此地步。

可是说到的改名事宜还不够。他大概感到和他同阶的卫立煌和刘峙都有用他们的名字作县名的，而他还没有。因此当1947年

3月19日，胡宗南军侵占延安。他自以为石碑七字应验了，竟狂妄地想把延安改为“宗南县”。但是改县名要通报南京当局核定，然后向全国公布，否则自己改了也等于无用。据说胡宗南已将所有应申报的手续都办齐了，不料没有几天，即翌年的4月，我军收复了延安。胡宗南的“宗南县”顿成南柯一梦。因而在旧中国地图上从未见有这个“宗南县”。

摘自《政海拾零》

ZHENGZHOU DAILY

编辑 孙明道 电话 67655582 E-mail:zzwbwh1616@sina.com

若干年前，因为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结合，一个崭新的生命降生了。那个崭新的生命就是你，或我，或他。自然，那个男人和女人便是你或我或他的父母。——我说的是我们的出生。在这个世上，每一个人，无论是谁，出生的时候其实都是一样的。而死亡——不管我们是否愿意接受，也不管我们是否想过，或早或迟，这一天是不可避免地要来的。但世上没有完全相同的两片树叶，同样，每一个个体生命的流逝也是不一而足，千态万状的。你可以活到老态龙钟而后慢慢死去，也可能死于随时可能发生的意外；你可以死得很安详，也可能永远死不瞑目；甚至在可能的情况下，你还可以选择自己想要的方式死去。

我所以想起这些，是因为最近和朋友的一次闲聊。朋友在医院做急诊抢救。聊着聊着话题自然而然地涉及到他的工作上。朋友仅仅二十多岁的光景，年轻，血气方刚，却被鬼使神差地安排在那个岗位，和那些陌生的生命一起，与死神搏斗。我不敢肯定，如果换了我，我是否能够有足够

当生命从指间轻轻滑过

二郎山樵夫

的勇气去面对和承受突如其来的死神的挑衅。透过朋友说起他所经历的那些死亡事件，我可以想见他面对死亡时发自内心的无奈和痛，那种无奈和痛一定是无法言说、无以复加的。

然后说到一个人的生命的可贵与脆弱。作为生命坚定的守护者，朋友曾经眼睁睁地目睹过无数个个体生命的消失和终结，而他却无能为力——在强大的死神面前，我们所做的所有努力往往是徒劳而又于事无补的，更多的时候，医生和死者、和死者家属一样，只能徒呼奈何。

当生命从我们指间轻轻滑过，然后，一切都就束了，但一切还会重新上演。朋友说，当那些个曾经活蹦乱跳的躯体渐渐变得冰凉，继而完全被白色覆盖的时候，他竟然突然间感到轻松了。我想我能够理解朋友所言及的那份轻松，和强大的死神搏斗，谁都不可能永远占有了上风；而在下一次的搏斗来临之前，我们有理由也理让自己获取片

刻的轻松，养精蓄锐。仔细想想，死亡本身对于死者又何尝不是一种轻松和解脱呢？你去看看那些被病痛折磨得痛苦不堪的躯体和灵魂，你就知道，活着对他们来说实实在在的在人间地狱，死亡无疑便是他们的天堂了，尽管这天堂看起来是那么遥远、不可知悉！

生或者死，从来就不是一个轻松的话题。所以伟大的莎士比亚说：活着还是死去，这是个问题。所以轮椅上的史铁生花去15年的时间才“终于弄明白：一个人，出生了，这就不再是一个可以辩论的问题，而只是上帝交给他的一个事实；上帝交给我们的这个事实的时候，已经顺便保证了它的结果，所以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。死是必然会降临的节日。”而在我的朋友那里便成了这么一句沉重而诗意的表达：当生命从我们指间轻轻滑过。因了这句沉重而诗意的表达，我的心亦跟着无地沉重起来。

是的，当生命从指间轻

轻滑过，我们总是以为自己紧紧拽着的手里一定会抓住些什么的，待我们猛然间打开时才知道，我们的掌心早已是空空如也。这个逝去的生命，或许陌生，或许熟悉，亦或许是我们的亲人；而此时此刻，一切都已经成为过去，无法再挽回……

和朋友们的这次交谈，就在这个初夏，一个美好的夜晚。其时，窗外的霓虹正不停地闪烁，这个城市正在漆黑的夜色里展示它与白天截然不同的风采。宽敞的大街上人来人往，人们或者行色匆匆，或者悠然自得地向着各自的目的地走去，或许他们本身就没有目的，只是在漫无目的地走，走，走。

人一出，便意味着有一天会死去。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无一例外地在一天天向着同一个方向在走，只不过是迟早与先后的问题，只不过许多时候我们把最重要的事情给忘记了，那就是——此时此刻，我们活着！

摘自《散文选刊》

当地渔民开始限量捕捞船鱼。

这则消息传到那个小渔村，小渔村开始沸腾了，人们奔走相告，庆祝这个喜讯。

日本有家电视台采访了这个故事，并把最后一位规矩劝人不要捕捞船鱼的老者请到了电视台。老者说，村人把自己的职业叫“灯塔”，因为“灯塔”虽然很小，很不起眼，但却可以引领船只的航向。

节目播出后，许多观众被这个故事深深打动了。一个人只要坚守，即使你再渺小，你也会成为一座大海中的灯塔，慢慢地开始引领航船的方向。

摘自《知识窗》

一个人的坚守

流沙

一个人只要坚守，你也会成为一座大海中的灯塔，慢慢地开始引领航船的方向。

在日本北海道附近海域，生长着一种名叫船鱼的鱼种，它们成群结队，在浅海里生活着。当地渔民最喜欢捕食船鱼，但在一个小渔村里，这种鱼却是“圣鱼”，不能随意捕杀，如果它们被渔网打上来，就应放生。这个小渔村里的人认为，如果捕捞船鱼，他们驾船出海时，就会遭遇恶浪，遭到船鱼的惩罚。

一个小渔村的风俗，显

然不能左右当地渔民的捕鱼习惯。但是这个小渔村一直不肯妥协，每到渔猎季节，小渔村就会派出一位德高望重的老耆到港口劝告渔民。

没有人能听信老者的话，他们早晨驾船出发，晚上捕了船鱼回来，大海一切依旧风平浪静。

但是，这个小鱼村仍然坚守着这条规矩，每当前一位老者年老体衰，小渔村就会再选派出一位老者，继续他们的劝功工作。

这样的风俗延续了上百年。

美文闲读

我愿意为你拆一座亭子

佚名

是让工人把亭子拆了。而他的孩子对拆亭子很感兴趣，他对父亲说：“爸爸，我想看看怎么拆掉这座旧亭子，等我从寄宿学校放假回来再拆好吗？”父亲答应很快就把旧亭子拆了。

孩子放假回来后，发现旧亭子已经拆除了，他闷闷不乐。他对父亲说：“爸爸，你对我撒谎了。”父亲惊讶地看着孩子。孩子说：“你说过的，那座旧亭子”

自由是枷锁中最粗的一条

吴淡如

把电视机开关打开，尽管并不想看，但害怕出现空洞的空间。玩到晚上，即使筋疲力尽，也要看看有没有酒吧可以走走逛逛，有没有夜生活的地方。结果，越玩越累。

也有些人不是以行动来把假假排满的，他们用的是语言。假期期间他们会一直谈论着已经离开的那个人和事——也许是一个讨厌的老板或同事、一个仇人又或是一个忘恩负义的情人。自己好不容易才得到喘息的空间，却又任由那些人的“魅影”随着自己来度假休闲，让自己永远不得安宁。

其实，我们的生活多半是出于自身的安排，不然就是我们容许自己已被一连串的行程安排。“不得不”都是我们自己告诉自己的。

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：企图让自己保持忙碌的人，是不是因为害怕孤独，才让自己忙得没有任何空闲？

可害怕孤独，就意味着害怕面对自己，害怕真

子要等我回来再拆。”父亲说：“孩子，爸爸错了，我应该实现自己的诺言。”父亲很快召集了工人，让他们按照旧亭子的模样重新在原地造一座亭子。亭子造好后，他叫来了孩子，对工人们说：“现在，你们开始拆这座旧亭子。”

福克斯说，我认识这位父亲和孩子，这位父亲并不富有，但是他却为孩子实现了自己的诺言。大学生们问：“请问这位父亲

叫什么名字，我们希望认识他。”福克斯说：“他已经过世了，但是他的儿子还活着。”“那么，他的孩子在哪里？他应该是一位诚实的人。”大学生们问。福克斯平静地说：“他的孩子现在就站在这里，就是我。”

言罢，台下掌声雷动。摘自《格言》

定下来，去面对来势汹汹的自由？

纪伯伦说，自由是人类枷锁中最粗的一条。我不知道，他的体会是否正是我的感觉，我是否害怕自由而自愿成为奴隶？美国国家公园之父约翰·缪尔在他的夏日日记中描写寻找羊群的经验，写的不只是羊，还有害怕自由的人类：

“我找到羊群时，发现它们害怕而沉默地缩在一起。显然它们已在这儿待了一个晚上又一个上午，根本不敢出去觅食。它们虽然逃离了桎梏，但就像我们所知的一些人一样，反而对获得的自由感到恐惧，不知道该怎么办，而且似乎还很高兴能回到原来熟悉的牢笼中。”

是因为害怕自由，才使我们日复一日过着不想过的日子，又或是不太甘心却又有点情愿地把自己交给忙碌呢？

很多人过完一辈子的时间，却少得可怜。我试着在行程表里清出一些空当，让自己有时闲体会无所事事的乐趣——我也不想一直与自由为敌，抗拒它的亲善问候啊！

摘自《青年参考》